

萧一山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田 园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5)

萧一山(1902—1978),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清史专家。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年仅22岁,就著成《清代通史》上卷,约56万字,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等纷纷作序给予高度赞誉。1925年,他出版了《清代通史》中卷。至抗战时期,他撰著了《清史大纲》,突出地表达了其“民族革命史观”。萧一山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前往海外搜集太平天国珍贵史料,并于回国后出版。1941年,他和陈寅恪两人当选为“部聘教授”。迁居台湾以后,他完成了《清代通史》全书410余万字的撰述,被誉为内容全面的“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清史大纲》也因具有鲜明的史观和提纲挈领的特色,被称为“传世之作”。

萧一山早年成名是与《清代通史》上卷出版之时,诸多史学名家赞誉有加。但此后学界一直罕见对其成就作研究、评论的学术文章。至1978年,萧一山在台湾遽然辞世,其生平好友和学界人士,才纷纷撰写纪念文章和短论性文字。大陆地区则至80年代中期开始有逐渐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发表。依据上述情况,兼顾时间先后和评论、研究涉及的方面,分以下五项对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对青年史家萧一山的褒扬

最早对萧一山学术进行评论和表彰的是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时八位名家为其所撰写的序文:《梁启超序》、《李大钊序》、《今西龙序》、《朱希祖序》、《蒋百里序》、《蒋梦麟序》、《杨栋林序》、《李泰棻序》(以上序文均见《清代通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些序文充分肯定了《清代通史》的学术价值、萧一山发愤撰史的可贵精神,对于研究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有指引之功,评价也各有侧重。

梁启超所写的《序》影响最大,他高度评价萧一山撰写《清代通史》的重要意义:“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认为此书虽未完稿,但于已读四篇体现出高度学术价值。“其所述者,为明清嬗代之枢机,为欧亚接触之端绪,为迹至繁,而不易理;为几至为微,而不易析。读其书,何其乙乙而抽,渊渊而入,若视庵摩罗于掌上,而嚼谏果于回甘也!”并称赞萧氏具有清晰的思路与开阔的视野,“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梁启超之言是对萧一山撰写《清代通史》的极大肯定,也是激励萧氏沿着“新史学”的道路探索前进,并最终完成这部四百多万字清史著作的巨大推动力。正如

萧一山在《自述》中所说“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

李大钊在序中指出,史学可以划分为普通史与特殊史两大类,《清代通史》是“普通史中的国民史”,其书“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精辟地从理论上综括萧氏此书具有“贯通”与“联系”的根本特点。

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序中指出:近世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萧一山撰写《清代通史》,“不畏难而识其要,可谓豪杰之士!且于史例,尤能斟酌科学,发挥所长”,可称得上当时的良史。萧氏能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做均衡铨叙,明确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其意义重大,殷切期望萧氏将此宗旨贯彻到撰著全书中去。他指出萧一山撰著清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经世意义,并对他“完成中国全部通史”寄予厚望。

李泰棻的序言明确归纳出萧一山撰史的4个优点:一是“于其官爵,禄位,兵刑,选举,学校之制,多纳于表;卷首并详列大事,俾读者一目了然”;二是运用了宝贵的清代皇家内阁档案、诏书这类第一手清代史料;三是善于以文史互证的方式撰史,其方法独特得当;四是尊重“传信”、“标名”的史学传统,尊重他人之学术。最后,李泰棻建议萧氏对于尚无定论之史料,宜持“审慎”的态度。

日本学者今西龙序也高度赞扬萧一山撰著清史“能够将浩瀚的旧材料,融化成自己的东西,又加上许多新史料,并且记述也安排得宜,详而且确”。

(二) 1978年以后有关萧一山生平传略的研究

1979年由台北经世书社出版了《萧一山先生文集》(上、下卷),该书下卷收录了16篇报章评介文章,以及34篇纪念文章,其中不乏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文献,主要有张其昀的《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包遵彭的《读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胡秋原的《我所知道的萧一山先生》、王家俭的《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杨家骆的《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稿跋》、余俊贤的《为历史文化奋斗的一代典型》等,这些文章使我们对于萧氏的学术成果及其生平各个方面有了具体而直观的了解。张其昀一文多用总结性的语言表述萧氏重要的学术地位。他认为萧一山抱经世之志,能“深究盛衰兴替存亡之道,岂非良史之楷模欤?”“特重史德,或考典章制度,或叙人事始终,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有清一代之文献,粲然在目矣。”包遵彭存萧一山的手稿于台湾“历史博物馆”,所撰文原载台湾《中国一周》杂志1963年第692期。他高度评价萧一山实践“新史学”之功绩,称赞“其于民族革命之源流,宪政运动之趋势,条分缕析,纤末无遗”,“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斯真可达渔仲、实斋所谓圆通之旨,而尽新史学有系统有组织之能事矣。”胡秋原之文认为萧氏贡献有三项:“一为清代通史五巨册之完成”,“二为太平天国史料及天地会史料之收集整理”,“三为民族主义与经世之学之提倡”。并对其学术见解从四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述。

萧立岩撰写的《萧一山传略》一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家人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丛书中,文章介绍了萧一山的生平事迹,并对其学术宗旨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他认为《清代通史》标题选用“通史”的“通”有其深刻的涵义。并认为此书特点是:一、取材宏富、融会贯通、文笔流利、条理清楚,给读者以明晰的历史概念;二、继承《史

记》撰写史表的传统,举凡清代重大事件、官制、外交约章、行政区划、学者著述等无不有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三、重视私家笔记和野史逸闻的史料价值以补官方文献之不足;四、对于清代农民起义多给予较高评价,对太平天国革命能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在当时尚属创举;五、重视经济史研究,与当时一般清史著作只知侧重于政治史、文化史者不同。结语高度概括了萧一山“一生事业著清史,搜集太平史料功,经世方为史学宗”之学术旨趣所在。

江地撰写的《萧一山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主要论述了萧一山的生平和治史经历,包括对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学课程,创办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实践其教育理想。后前往欧美考察文化教育,在河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并与范文澜等进步教授一起创办《经世》半月刊,宣传抗日救国,等等,均缕述甚详。

(三)有关萧一山两部代表作《清代通史》和《清史大纲》的研究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家范、陈捷先、李治亭、杜家骥四位学者所撰写的专论性文章。前三篇是论述《清代通史》的,后一篇是对《清史大纲》的评介。

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是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萧一山《清代通史》所写序言,对萧一山的生平事迹、学术交往和学术论争十分详尽,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线索。作者指出晚清学界清史研究著作“失之简略,大多仍不脱王朝政治史藩篱,无法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同时《清史稿》的修撰成为“烂尾工程”,日本史学界对清史的撰述已经捷足先登,1914年,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问世。在此局面之下,萧一山以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于是凭一己之力撰述《清代通史》,并有上卷、中卷之出版。第二部分回顾萧氏的家学影响以及在北大学习期间刻苦治学的经历,指出由于其遇到北京大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的时机,得以成功撰述史料极其繁富之清史,以及前往欧洲搜集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前因后果。第三部分,讲述萧一山与梁启超、蒋百里、蒋梦麟等学者的师生情谊。时《大公报》副主编吴宓曾批评萧一山“革命意味过重”,而金陵大学教授陈恭禄与萧一山在《大公报》上分别撰文,发生过激烈的学术论争,“清史上的很多问题也都因《清代通史》一书的出版而得到定论,或被大多数人接受。”

同样评论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学术特色和成就,台湾学者陈捷先的文章与王家范风格迥异(《〈清代通史〉书评》,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文章首先叙述萧一山生平与求学过程。其次,论述了《清代通史》的篇章与编目,并总结其著述特点在于“体裁新颖,组织严谨,文字流畅,考据详确,极尽夹漈、实斋贯通之义例”;又重点阐述萧氏重视民族革命,对于清代的革命事件往往有“不同于流俗”的看法等;作者认为萧氏“摆脱了传统狭隘民族立场”,树立了对于民族问题的正确态度。文章最后指出其搜集史料存在时代局限性及其对于“那些客观存在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事实,不是视而不见,便是避重就轻地依附于民族问题之下”的缺点。

李治亭所撰《一部新型的清代历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载于马宝珠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萧一山《清代通史》予以肯定:一、叙述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出版、增补、修订完成的全部过程及其生平

概况,列举其学术著作,赞扬萧氏治学精勤不懈的精神。二、叙述萧一山作为北大“一个在读的大学生竟然一举写成这部长篇清史”,因而获得当时诸多名家的盛赞。并以多次再版的事实证明此书的学术价值并非徒有虚名,实为清史“佳著”。三、强调萧一山在史料极度缺乏、学术研究几乎空白的困难情况下,开展《清代通史》的撰写工作,能够“采取标准的章节体,大者为篇,中者为章,小者为子目,编排严谨,次序井然,第一次将清朝的历程变为系统的文字记述的历史”。指出以章节体编纂的体例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萧氏成功地“抓准了清史的‘源头’”,“以时间为序,分阶段地记述其方方面面,如政治状况、制度沿革、军事斗争、文化嬗变、民族关系的变迁、疆域的开拓、中外交通与条约的签订、清初学术思想之大势与成就,以及人物的评价等等,内容至为详尽,充分展示了清朝多姿多彩的历史。”且认为萧一山撰史详实全面、注重考证,也能本于“疑则传疑,信则传信”的优良传统,以客观的标准和正确的历史观来评价清代历史人物。作者还认为《清代通史》史料达到六、七百种之多,重视将清代内阁档案直接应用,有明显的史料优势。并指出在《清代通史》中萧氏以白话文与浅近文言相结合,交互使用,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语言巧妙,叙事生动,极具“语言文字之美”的特点。

至于李文批评萧一山“明确否定‘唯物史观’,确定以‘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来‘均衡铨叙’清史,故上、中两卷很少写经济方面的变革,一切‘以政治为纲领’,强调政治才是‘支配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显然,作者是以唯心史观来评述清史的。”这一观点恐有失公允,《清代通史》虽未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但其上卷和中卷中关于经济史内容是占有较合理篇幅的,合计有29节之多。萧氏所论“文化、政治、生计”,生计即是经济的内容,这三者平衡发展,内在相关联,本就是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方法有诸多“类通”之处。在政治思想上,作者认为“本书贯彻了反清排满的思想倾向”,“把清史称为‘中华民族革命史’,即汉族反对满族的革命斗争史”。其实萧一山在导言中即指出,清代革命是分阶段的,这种划分体现出民族革命的“一贯性”与“连环性”,其主旨是反抗民族压迫、抵御列强外侮、实现救国方案。

杜家骥为《清史大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重新出版撰写了导言,他认为“萧一山在这部《清史大纲》中,主要是表达他的‘民族革命’观点”。此书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写作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体现了作者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经世’目的,令人钦佩。”他认为该书内容丰富,文字简洁,重视人民的生活及习俗,列举城乡社会之组织。他强调萧一山以“民族革命史观”为“纲”和“主线”,从世界发展的大势着眼,把反对外侮的民族革命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作者指出书中“十章中的七章都是关于‘民族革命’的内容”,“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极高评价,称其‘意义非常重大,它的影响相当长远’”,“对其所赞誉的洪秀全及其领导的运动不‘曲笔’而是全面客观地反映”。作者指出萧一山把“戊戌变法称为是以自强为目的的民族自觉维新运动,而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国民革命运动”为本书主旨内容。认为其缺点是“清代前期、中期的内容显得太薄弱了”;且把“满汉民族矛盾与中国和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视为同一性质”;对于萧氏评述某些史事的偏激之处,在史实叙述上的不严谨之处一并指出。不过,此文中有有的看法值得商榷。如称萧氏评价乾隆皇帝有过激言论,实际上,乾隆皇帝对国家财富的挥霍以及和珅擅权造成的严重后果,对社会的影响不是在当朝能立即显现的。

(四) 关于萧一山史学成就、史学方法其他方面的研究

1. 关于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的论述。李先成《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及其清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2期)一文论述萧一山撰写《清代通史》的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在抗战以后,萧氏“这种思想在现实民族救亡运动的催化下更趋鲜明”;至1943年,萧氏在《清史大纲》中又作了更加完整的阐述,对“民族革命史观”的发生、发展至成熟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李先成肯定了萧一山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局实肇于三百年之前明清之际的观点有一定的意义。作者认为萧一山“对清代史上某些重大事件人物,特别是农民起义或运动作出了不同流俗的评价和解释。”这种观念“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中,已经算是难能的事”。指出萧一山所持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混血的民族”、“建立各民族的平等关系”等观点,“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顺应了历史潮流的需要”,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作者称萧一山有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嫌疑,以及萧氏仍“持旧史家观念”的批评,笔者认为萧一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其思想观念必然会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2. 关于萧一山史料学成就和方法的论述。在《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萧一山辑,国立编译馆,1936年)序中,朱希祖指出:萧一山编辑出版此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认为太平天国重要史料由于受到严重的毁坏不能“宣扬于世”,而公文案卷为“历史之直接材料”,大多散落于国外,其中还包括了《天朝田亩制度》等史料之精华。朱希祖充分肯定萧一山前往海外影印太平天国第一手史料的功绩,指出“萧君之功,盖其成绩比程、刘二君更弘大也!”

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在《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序(中华书局,2004年)中指出:“刘半农、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向达……各有收获,犹以程、萧、王三位贡献突出,各影印专书行世,出版有《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丛书》、《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国书翰》、《太平天国诏谕》等书。”并说明他本人在台湾中研院“获见尘埋已久的洪仁玕和洪天贵福的珍贵手写文书,而我所以得知台北有此珍藏,系受惠于萧一山先生的著作”。罗尔纲撰写《太平天国史》时也大量引用了萧一山整理的《太平天国丛书》以及《太平天国诏谕》的内容。其他如郭毅生所撰论文《如何评价杨秀清》、以及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也都一再引用萧一山整理的文献。

3. 关于萧一山政治思想及其与史学之关系的论述。张光华的《学人问政——萧一山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一文,认为萧一山的政治学理论是与他“治史”和“经世”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萧一山力主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其中就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因此张氏的观点值得商榷。

4. 关于萧一山史学特色的论述。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论述“清史的研究以孟森及萧一山先生的贡献的最大。”汪效驷《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论述萧氏人文主义、民族激情以及经世主张。他认为《清代通史》填补了当时同类著作的空白;其体例有所创新;史料丰富、考证严密,能“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着眼”,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并能知中国变迁之大势,

是萧一山“对近代新史学的贡献”。

5. 其他相关论述。如张光华的论文《萧一山〈清史大纲〉两度更名原因蠡测》(《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主要探究了《清史大纲》先后更名为《清代史》、《中国近代史概要》的原因,认为萧一山屡更其名,是为了“除去《清史大纲》所含的简编之意”,也是为了表明其“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史学认识,以体现该著作的核心思想与内容,由此可见萧氏对学术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仍在许多方面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

《中国儒学发展史》评介

周德丰 杜运辉

(南开大学哲学系 天津 300071)

由黄宣民先生及其弟子陈寒鸣副教授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20万字。该书由黄宣民先生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先生于2001年因病辞世后,陈寒鸣副教授遵照乃师遗愿,继续进行整理、增补和定稿,使这部历经20余年不懈努力、凝聚了诸多学者集体智慧的煌煌巨著终于得以面世。通读全书,可以发见《中国儒学发展史》至少表现了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继承和弘扬“侯外庐学派”的优良传统,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该书绪论提出:“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绪论”,第3页)这一指导思想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体现出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把儒学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中国农业宗法型社会形态决定了儒

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和基本理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又重视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对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演进这一双向运动的辩证分析揭示了儒学产生、演变的基本规律,这使该书具有一种博大厚重的历史感,引导我们从中国社会流变的角度来透视儒学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来观照儒学的当代发展。

二、肯定经学是儒学的灵魂与核心,系统论述儒家经学的历史演变。该书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而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则是儒学的灵魂与核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实际是对元典进行重新诠释的形式展开的,儒家经学由此而在中国思想史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